

細的「英雄譜」，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這既非學術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個興趣廣泛的讀書人，以他的眼光、趣味與人脈，勾勒出來的「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某一側影。若天遂人願，舊雨新知不斷加盟，衣食父母繼續捧場，叢書能延續較長一段時間，我相信，這一「圖景」會日漸完善的。

最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第一，作者不限東西南北，只求以漢語寫作；第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目前僅限於人文學；第三，不敢有年齡歧視，但以中年為主——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這三點，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目錄

自序	001
錦綺之花：佛經的翻譯與文本	005
略論大乘《大般涅槃經》的傳譯	029
北涼曇無讖依龜茲國文字說十四音事辯證	073
鳩摩羅什《通韻》考疑暨敦煌寫卷S.1344號相關問題	101
謝靈運《十四音訓敘》輯考	119
譬喻師與佛典中譬喻的運用	167
禪宗所傳祖師世系與印度的付法藏傳統	189
「洛州無影」與「天下之中」	223
「雜藏」考	247
鄭樵《通志·七音略》中的「胡僧」及其他	271
作者簡介	293
著述年表	294

自序

本書是我過去二十多年發表的部分論文的結集，內容涉及印度和中國的佛教語言、文獻與歷史，也可以說大多與古代中印文化的交流有關。論文中，最早的寫成於一九九一年，最晚的寫成於二〇一三年，前後發表在國內的一些學術刊物上或者收入論文集中。現在集合在一起，印成書，一方面我想算是一個小結，另一方面也許會方便對這些問題有興趣的人，雖然這樣的人我估計數量有限。

佛教的研究，不是新題目。作為一種宗教，佛教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很大的影響，無論是研究中國歷史，還是中國思想，抑或中國文學，或者中國的考古和藝術，往往都會牽涉到佛教。近代以前，中國也不是沒有人研究佛教，但傳統的佛教研究，與傳統中國其他很多學科的研究一樣，到了近代，顯示出很大的局限性。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學者對佛教的研究，有了新的變化，變化最大的，是研究視野和研究資料的擴大，研究方法也有很大的更新。這樣的變化，與近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形態變化直接有關。認識到這一點，在今天說不上有多新鮮，但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文革」結束不久，中國的教育和學術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尚處在恢復時期，一切重新開始，「撥亂反正」，一下要明白其中的道理，並不太容易。至少在我自己，當時得到這樣的體會，到現在還有很深的印象。

在佛教研究方面，我唸研究生時的導師季羨林先生，還有我雖然沒有見過，但一開始就讀他們書的一些先生，陳寅恪、胡適之、湯用彤、呂秋逸，處於這種學術新舊轉換之際，他們的研究取向和路徑，基本上都是這樣。他們所做的研究，既注意新材料的發現，又有新的眼光，同時嘗試新的方法。他們既有才具，又有見識，所以各自在研究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我們這一代人，雖然很多地方難與老一輩的學者們相比，但畢竟可以以他們為榜樣，用漢代司馬遷的話說，「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何況，如果真是追求學術，追隨先賢，其間不是也能獲得一種愉悅嗎？

與佛教相關的，是中印文化交流的歷史。書中的文章，內容也都與此相關。中國和印度都是亞洲的文明古國，歷史悠久，文化傳承至今不斷。中印又是近鄰，文化的交往至少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這些年來，我時常在想，人類歷史上曾經產生過多個文明，但延續至今，對人類的發展有過重大影響的文明並不多，人們往往舉列的有四大或者五大文明。不管幾大，其中一定包括有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兩千年來，中國與印度，除了上世紀的六十年代，有那麼一次時間很短，規模有限的邊界衝突以外，所有的時間，都是和平相處。這在世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界歷史上，其實很少見。印度文化中很多東西，主要通過佛教，當然也包括其他的途徑，被中國人所接受，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其中不僅是宗教，還有語言、文學、藝術、民俗，各個方面，以致我們今天幾乎感覺不到它們來自印度。中國文化從來不是孤立生長的，兩千多年來與印度以及其他國家、其他文化的交往與互動一直未間斷。這樣的交流與互動，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真是功莫大焉。明白這一點，也許可以讓我們對今天中印兩國的和諧相處有更積極的一種態度，也有助於我們開放和理性地評價中國文化。沒有中外文化的交流，就沒有今天的中國，過去是這樣，今後也一定是這樣。狹隘和自大，以為只有自己的文化才稱得上優秀，其實是愚昧和無知。不過，如此鼓吹的人往往是另有考慮。

「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是這些年常被提到的兩個詞語。拋開某些宣傳上的口號不論，這兩個理念所概括的內容，所代表的價值取向，是正確的，我完全認同。這本書裡所討論的，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也就是歷史上中印文化之間交流互鑒的一些問題和例子，所以我用這兩個詞語作為書題。

感謝叢書主編陳平原先生的好意。平原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學的同事。編這本書，是他的提議。他提出這個建議，是在二〇一六年三月。但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我竟然也拖延了快兩年的時間，真有點辜負平原先生的好意了。

香港三聯書店接受這部書稿，沒有提出任何條件。我的工作如此拖還，書店出版部的經理梁偉基先生和責任編輯李斌先生，對我都是同樣的寬容，因此我也必須對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〇一八年元月十一日於北京大學燕北園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錦綺之花：佛經的翻譯與文本

佛經的翻譯是一個在不同的場合下被討論過，而且已經討論得很多的問題。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依據不同的材料，以宏觀或微觀的形式做過討論。近一百年來，日本學者在這方面做的工作尤其多一些。

過去的討論，在研究佛教歷史和文獻的學者中，更多地是從實證出發，具體涉及到佛經翻譯的途徑，翻譯方法，譯語、譯文的理解，很多時候也涉及到文獻的來源以及經錄等問題。而在研究所謂的翻譯學的學者中，則比較宏觀，近年來更傾向於引進一些西方的翻譯學、比較文學或者比較文化學的理论，試圖來做更多，也往往被認為是更新的闡釋。除此之外，近年來也有一些研究漢語史的學者，利用漢譯的佛經作為語料，這中間常常也要涉及到佛經翻譯中的一些問題。

本文不準備討論某一部具體的經典的翻譯，或某一位譯人的翻譯活動，或某一種翻譯理論應用的可適性，僅僅提出幾個與古代佛經翻譯相關的問題。提出這些問題的背景是，討論佛經的翻譯，是不是還可以從佛經的產生，佛經在兩千多年間流傳的歷史以及文化交流和互動的角度來做一些思考。這一角度，似乎也接近與當今幾個比較時髦的學科名稱，如文本發生學、文本解讀、闡釋學、文化傳播學等等所要討論的題目。不過，在我看來，名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怎麼認識佛經翻譯這一已經存在兩千多年，同時現在仍然還在進行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的現象和過程。從文化史、翻譯史以及佛教史的角度而言，如果我們對此能夠有一個比較精細而不是粗疏，具體而不是模糊的描述，一些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也許能比較容易得到解決。

我先提出幾個問題，必要時舉一個或幾個例子，然後就這些問題談一下我的意見。這幾個問題分別是：一、經典怎麼形成：早期佛經的語言和翻譯問題；二、經典怎麼流傳：佛經流傳過程中的文本；三、翻譯還是文本轉換：漢譯佛經的特點；四、「政治」：文本轉換的另一個例子；五、一點餘論：翻譯是什麼？

以下是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當然，所有這些，都有待於同行們的指正和做進一步的討論。

一、經典怎麼形成：早期佛經的語言和翻譯問題

依據一般的說法，釋迦牟尼在公元前六世紀或是五世紀創立佛教。佛教一經創立，就有了廣泛意義上的佛經。佛教講佛法僧「三寶」，其中的法寶——有時用 *Buddhavacana*，即「佛語」這個詞來代表——一定意義上講就是指佛經。這與佛教早期的歷史有關。這樣的說法，如果做寬泛的理解，基本上可以接受。

最早的佛經究竟是什麼樣，我們實際上並不清楚。我們現在見到的佛經，即使可以判斷為最早或者可能是最早的文本，都大大晚於釋迦牟尼的時代。不過，通過分析和研究，我們還是可以發現一些與最早的佛經——上個世紀的一些學者往往稱此為原始佛典（Urkanon）——相關的痕跡。從研究的結果看，這些最早的佛經，主要有這樣一些特點：

首先，它們最早只是口頭流傳的釋迦牟尼的一些教言，在釋迦牟尼在世時或去世後，由弟子們編輯，而後通過所謂的「結集」（saṃgīti）才逐步成為經典。這個過程，與中國古代的《論語》成書的過程有些相似，但規模更大，過程更複雜。二者在時間的尺度與地域的廣度上不可比擬。

其次，記載最早的佛經的語言不大可能是巴利語，更不可能是梵語，最大的可能是古代印度東部的某種或者某幾種方言。根據德國學者 Henrich Lüders 的推斷，是古印度的半摩揭陀語（Ardhamāgadhī）。〔1〕當然，也有不同的意見，但所有的不同意見也說不上有更有力的根據。因此，我們仍然可以設想，今天見到的巴利語的以及其他早期印度語言的佛經，例如犍陀羅語佛經，其核心部分，一定程度上都是從一種原始佛典語言（Ursprache）的佛經轉換而來。〔2〕

再次，這樣的轉換，既包括文本形式的轉換，也包括語言的轉換。在我看來，這種轉換

的過程，整個的講，其實就包含著各種形式的翻譯，但這種意義上的翻譯，其中包含的內容，遠比一般理解的翻譯要大得多，豐富得多。

因此，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佛教經典在形成的過程中，很早就與翻譯有關係。這種翻譯，在一開始，只是在中世印度雅利安語（Middle Indo-Aryan）範圍內兩種或多種分支語言，包括巴利語、犍陀羅語、其他俗語、梵語等之間的翻譯。在佛教傳到印度以外的地區以後，情形又有所改變，佛經被翻譯成非印度的語言，這中間發生的變化當然就更大了。

二、經典怎麼流傳：佛經流傳過程中的文本

歷史上的佛經怎麼流傳，可以討論的問題有許多，這裡只談與文本有關的問題。最原始的佛經缺乏實例，不好做討論，但早期的佛經流傳下來的有很多，我舉幾個例子，首先舉《法句經》。

〔1〕 Henrich Lüders: *Beobachtungen über die Sprache des buddhistischen Urkanons*, Berlin, 1954.

〔2〕討論最早佛經的語言問題，中文出版物中可以參考季羨林：《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討論這一問題的大部分西文著作，季先生的書中都有引用。

不管在南傳還是在北傳的系統中，《法句經》都可以說是一部很重要的經典，尤其是南傳。現存的《法句經》，最為人熟知的是巴利語本的 *Dhammapada*。在斯里蘭卡和東南亞地區南傳佛教的範圍內，巴利語本有名很自然。在南亞以及東南亞以外的地方，尤其是歐美地區，巴利語本的《法句經》有名，主要是因為最早的西文譯本所依據的是巴利語本。巴利語本二十六品，屬於上座部的傳承系統，這一點眾所周知。

除了巴利語本的《法句經》，保存在印度語言 (Indic languages) 中的還有三種《法句經》。與巴利語《法句經》不同的是，這三種《法句經》，早些時候並沒有人知道，它們被發現以及對它們的瞭解，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他們也都不屬於上座部的傳承系統。

第一種是有名的犍陀羅語《法句經》(*Gāndhārī Dharmapada*)。這部《法句經》使用的語言是印度古代西北的方言，即現在一般所稱的犍陀羅語。經卷寫在樺樹皮上，用佉盧文抄寫，本世紀初在中國新疆的和田地出土，後來被分別收藏在法國巴黎和俄國聖彼得堡。發現的當時，曾經在國際東方學界引起過很大的轟動。但直到上世紀的六十年代，英國劍橋大學的教授 John Brough 經過長期的研究，才出版了他的一個完整的校刊本，校刊本同時包括他所做的研究。犍陀羅語《法句經》不是全本，是殘本，Brough 整理的校刊本存二十二品。^[1]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以來，從阿富汗陸續流出的文物中，也發現了一些寫在樺樹皮上

的最古老的佛經，其中也有犍陀羅語的《法句經》，不過只是些片段。^[1]

第二種是梵語本，但名字不叫《法句經》，而是 *Udanavarga*。這是德國學者 F. Bernhard 根據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在中國新疆地區發掘所獲得寫本殘片，即所謂 Turfanfunden 的一部分，重新恢復出來的。梵本經文有三十三品。^[2]此外，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日本學者中谷英明從法國伯希和從庫車蘇巴什 (Subashi) 佛寺遺址掘得的梵語寫本中，也整理出一部

【1】 J. Brough: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 Richard Salomon: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Washington Press, 1999; Timothy Lenz: *A New Version of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and a Collection of Previous-Birth Stories: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16+25*, Gandhāran Buddhist Texts 3, Seattle, 2003. 我十多年前為前一本書寫過一篇書評，見《敦煌吐魯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五卷，頁二四二—二五三。

【3】 *Udanavarga*, Sanskri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X, hrsg. von F. Bernhard, Band I (Einführung, Beschreibung der Handschriften, Textausgabe, Bibliographie), II (Indices, Konkordanzen, Synoptische Tabellen), III (Der tibetische Tex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5, 1968, 1990.

Udanavarga，內容有殘缺，只能說大致完整。^{〔一〕}

第三種《法句經》來自西藏。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中期，印度學者 *Rahula Saṅkṛtyāna* 四次進入中國西藏地區，尋找從印度以及尼泊爾流入西藏的梵文經典。這是他在西藏見到的梵文經典之一。*Saṅkṛtyāna* 對一些經典拍了照片或者做了筆錄。這些照片後來保存在今天印度比哈爾邦的首府巴特那的一個研究所。照片中包括這部《法句經》，因此這部《法句經》後來又被稱作《巴特那法句經》(*Patna Dharmapada*)。時間已經過去了七十多年，原件是否還在西藏，在西藏的什麼地方，目前沒有人知道。

這部《法句經》的校刊本有兩種：一種是德國學者 *Gustav Roth* 的校刊本，^{〔二〕} 另一種是英國學者 *Margret Cone* 的校刊本。^{〔三〕}

從語言上講，這一部《法句經》只能勉強算是梵語本。說勉強，是因為這部《法句經》的俗語化程度很高，我們既可以說它是包含很多俗語成分的梵語本 (*Sanskrit version with much Prakrit elements*)，但也可以說它是還沒有完全梵語化的俗語本 (*Prakrit version not yet fully Sanskritized*)。

從這四種印度語言的《法句經》，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即使是同名或不同名但內容基本相同的一種佛經，可以有不同的文本，還可以用不同的語言撰寫，而且這中間的情況非常複雜。它們之間，既有文本轉換的問題，也有翻譯的問題。

但更複雜的是漢譯的《法句經》。在漢文三藏中，現存的《法句經》或者說內容與《法句經》基本相同，但名稱略異的經典至少有四種。

第一種是三國時的翻譯，經名就是《法句經》，翻譯的時間很早，屬於中國歷史上最早翻譯的佛經之一了。全經三十九品，漢譯兩卷。^{〔四〕} 經前題名講「尊者法救撰，吳天竺沙門維祇難等譯」。與維祇難合作的有竺將炎，也許還有支謙。

《出三藏記集》卷七有《法句經序》，這是關於《法句經》的一篇文章。其中講到《法句經》如何產生和形成的過程：

【一】中谷英明 (H. Nakatani) : *Udanavarga de Subaṣi*, Paris: Institut de Civilisation Indienne, Tome I - II, 1987. .スバシ寫本の研究 (京都:人文書院, 一九八八年)。

【二】G. Roth: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Languages of the Ārya-Mahāsaṅghika-Lokottaravādins and their Importance for Early Buddhist Tradition. 2. Text of the Patna Dharmapada", in *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 (Symposien zur Buddhistenforschung, II)*, Vandenhoeck & Ruprecht in Göttingen, 1980, pp. 97-135.

【三】M. Cone: *Patna Dharmapada, Part I: Text,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Vol. 13, 1989, pp. 101-217.

【四】收入《大正藏》卷四。